

【史苑杂谈】

19 世纪末档案文献对香港鼠疫的记载

黄雁鸿

清末，华南地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传播的鼠疫，受影响者众，死亡数字惊人。在英国皇家海军当年的年度报告中，讲述了鼠疫传播到香港的过程：“香港出现严重的鼠疫疫情是在 1894 年的 5 月，刚过了一个中国的大时节。当时 90 公里以外的广东自从 2 月开始就不断有鼠疫发生，导致的死亡人数多达 6 万人。审视香港的疫情，无疑是传自广东；而广东的鼠疫，却可能源自云南。”^① 香港 900 公里以外的云南省，每年都受到鼠疫威胁。到 1894 年初，距离香港 400 公里的北海也发生鼠疫。1894 年的春天，这波疫情袭向香港。

关于这次鼠疫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却鲜有涉及这场疫症的档案收藏和使用情况。事实上，港英政府留下了大量档案，国外的医疗报告和外文报章也对这次鼠疫有深入的叙述和分析。

一 香港鼠疫情况

20 世纪初印度鼠疫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Plague in India）顾问马田医生（C. J. Martin）在 1911 年发表的报告显示，1894 年在广东出现之后蔓延至香港再传播到全球的鼠疫，可说是影响最广的一次鼠疫疫情，由于造成的死亡情况和社会危害非常惨烈，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第三次全球鼠疫大流行的肇始。“在最近 15 年来，于全球蔓延最广的一次鼠疫可说是 1894 年的那一次。当时发源于广州，很快香港就出现病例。这两个都是港口，尤其后者更和世界其他地方有频繁的船务往来。1895 年，鼠疫在邻近的中国港口城市出现；到了第二年扩散到孟买以及台湾。在印度，鼠疫在过去 15 年在全国传播，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 700 万人。”^②

1894 年 5 月初，鼠疫传入香港。当时的殖民地总医官劳森医生（Dr. J. A. Lowson）是处理疫情的关键人物，他对疫症的传入、蔓延、医治、处理、防范以至平息的过程了解甚深。劳森医生在日记中记载了鼠疫在香港传播的过程：“1894 年 5 月初，香港有传言出现鼠疫。5 月 8 日，政府医院出现第一名鼠疫患者。5 月 10 日，政府宣布香港成为疫埠。5 月 29 日，出现第一名染病英军。6 月 11 日，因压力巨大，医护人员拒绝工作。6 月 14 日，日本细菌专家北里医生发现鼠疫罪魁祸首——杆状形细菌。6 月 23 日，法国医生耶尔辛（Dr. A. Yersin）在香港发现杆状形细菌。7 月底，疫情得到控制。9 月，疫情趋于平静。”^③

《申报》于 1894 年 5 月 5 日刊出香港刚出现鼠疫的情况：“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日即毙。其病初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④ 根据《申报》所载，广州和香港的疫情持续了大约三四个月，到 1894 年 8 月，香港的疫情逐渐消失^⑤，死亡人数在两三千人左右，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为 2552 人^⑥。当时在香港工作的英国医生云尼尔（Dr. A. Rennie）于 1894 夏天撰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告，指出这次鼠疫在香港造成的死亡人数不超过 3000 人^⑦。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鼠疫虽然平静下来，但并没有彻底消失。自 1895 年开始，香港几乎每年都会发生鼠疫，而且集中在 4—7 月这几个天气炎热的月份。据欧洲公共卫生学校组织（As-

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Health) 于 1910 年代发表的报告, 1895—1901 年鼠疫造成的香港死亡人数为 6387 人^⑧, 可见鼠疫当时在香港已演变成风土病。

鼠疫爆发时, 港英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遏制疫情, 包括医治、消毒、隔离和清洁^⑨等。港英政府还特别注重讯息交流和事件检讨。除大量提交给政府的医学报告之外, 港英政府和香港民间还留下了大量档案和报告, 以此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疫情、采取的措施及民间的反应等情况。

二 有关鼠疫的港府档案

19 世纪的香港政府档案主要包括《香港政府公报》(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香港行政及立法局会议记录》(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香港立法局议事录》(Hong Kong Hansard)、《香港政府行政报告》(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s) 和《香港蓝皮书》(Hong Kong Blue Books) 等等。此外港英政府还会定期向宗主国英国提交香港情况的报告, 分别收录于英国殖民地部档案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Records, 简称 C. O.) 和外交部档案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简称 F. O.), 对于香港社会、经济和民生事务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香港政府宪报》是香港政府的官方公告, 自 1853 年以独立形式刊行后, 基本上是每年为一卷, 卷数和编号一直接续。和 1894 年鼠疫有关的公告约有 200 份, 其中最多的是洁净局 (Sanitary Board) 的会议记录以及立法会会议记录, 还有和公共卫生有关的法律法规, 例如 1894 年 5 月根据 1887 年《公众健康条例》的基础颁布的《鼠疫章程》12 条^⑩、《鼠疫章程》附例^⑪、《隔离鼠疫患者条例》^⑫、《清洁条例》^⑬和《传染病章程》^⑭, 这些法规都在《香港政府宪报》上刊登全文。

除了会议记录及相关法例外, 《香港政府宪报》中有两类关于鼠疫的文件较多, 一是各部门防治鼠疫的工作报告, 二是清洁环境报告。为肃清鼠患, 港英政府对华人聚居的太平山进行大整肃, 因此相关部门提交了太平山区的整治报告。关于防治鼠疫的政府工作报告约 20 份, 涉及部门包括洁净局 (Sanitary Board)、园林管理处 (Botanical and Afforestation Dept.)、公共事务 (Public Works)、海港部门 (Harbour Master)、登记部门 (Registrar General)、医务委员会 (Medical Committee)、政府兽医 (Colonial Veterinary Surgeon) 以及警察部门等。

工作报告以洁净局提交最多, 内容主要是防疫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 有工作报告讲及因太多人染病, 人手短缺对政府的日常工作产生影响。此外还刊出了皇仁书院 (Queen College)、保良局及维多利亚监狱 (Victoria Gaol) 于 1894 年的年报, 其中叙述了这些机构鼠疫患者及死亡人数。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政府宪报》只单独刊出上述机构 1894 年的年报, 原因可能是当年鼠疫导致的死亡人数太多。关于太平山整治的报告则有两份, 都是汇报工作进度。此外还有医学调查报告, 如《东莞鼠疫》(Plague in Tungkun, Dr. Westcott's Report)^⑮、《政府医生报告》(Report, Colonial Surgeon)^⑯等, 内容涉及东莞鼠疫情况、香港疫情严重的原因及政府抗疫措施的成效、各医院病患及病死情况、病患的症状、医疗手段以及对华人医院及中医的医疗成效评估及管理建议。

《香港立法局会议文件汇编》(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主要内容为立法局每次开会用作讨论议事项目的有关文件, 并附录港督或港英政府委任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1894—1895 年关于鼠疫的记录或报告约共 19 份, 包括工作报告、医学报告、财政报告、统计数字以及抗疫的成效检讨。还有政府官员的讲话, 如港督罗便臣 (Sir William Robinson, 1891—1898 年在任) 于 1894 年 6 月 20 日向立法局汇报鼠疫为香港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⑰。

此外, 《香港立法局会议文件汇编》也收录了医疗、教育、海港部门和洁净局的工作报告, 还附上立法议员对防疫工作的质询。此外还有医学报告, 如 1894—1895 年香港鼠疫情况的报告

(*Medical Report on Bubonic Plague*)^⑩和《1896 年调查东华医院委员会报告》(*Reports on the Tung Wa Hospital*)^⑪。港英政府不满东华医院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认为是医院管理混乱及中医手段不科学导致死伤严重,在疫情结束后特别成立调查委员会检讨东华医院的组织运作,特别是审视医院在应付鼠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⑫,该报告长达 200 多页,除了 3 份调查委员会提交的主体报告之外,还附录证人证词、医院创建缘起以及医院改革方向的相关备忘录和来往函件。

《香港立法局议事录》内容主要为会议程序表、港督的演词、立法局通过的法例原文、议员的发言及投票情况。1894—1898 年关于鼠疫的议事录约 40 份,记录了立法局议员就鼠疫所提出的质询、官员回应,以及专责委员会所审议有关疫情的会议记录,包括财务委员会讨论应付鼠疫的开支问题、海港管理局(The Harbour Masters)对旅客的监控措施、洁净局对抗鼠疫成效的评估等^⑬。

《香港蓝皮书》是香港政府各个部门每年工作的简报,在鼠疫肆虐的 1894—1898 年,政府医院、公共事务部以及税务部门的简报中皆有讲及鼠疫部分。政府医院简报罗列了专治鼠疫病患的医船海之家(Hygeia)的资料,包括病人分类、医护人员的数目、病患数目、死者数目以及病因及死因等,实为研究香港传染病的珍贵资料^⑭。

英国殖民地部档案是研究香港殖民地历史最为重要的档案之一,其中涉及此次鼠疫疫情的档案主要在 C. Q. 129、C. Q. 131 和 C. Q. 133 卷宗内。港督需向殖民地部大臣汇报香港所有的内政事务,向其请示对策,殖民地部大臣会回函批示。这些档案中关于此次鼠疫的文件约 90 份,日期从 1894 年 5 月至 1895 年 4 月,讲述了卫生、疫情趋势、政府相关公布以及洁净局报告等^⑮。C. Q. 131 主要收录了香港多年的蓝皮书(*Hong Kong Blue Books*),C. Q. 133 则收录《香港立法局会议记录》(*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两者上文已做介绍,不再重复。

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关于香港 1894 年鼠疫的内容主要收录在编号 F. Q. 17 和 F. Q. 228 的档案中。F. Q. 17 收录了 1906 年以前涉及中国政治及其他事项的汇报。与本次鼠疫有关的档案约有 67 份,编号分别是 1190—1211、1222—1251,内容主要是 1892—1895 年间任英国驻大清国公使欧格纳爵士(Sir Nicholas Robert O'Conor, 1843—1908)以及 1895—1896 年英国驻大清国署理公使赛克乐(William Nelthorpe Beauclerk, 1849—1908)向英国发出的外交文书、使节信函、电汇及汇报。很多文件记述了为避疫症由大陆传入,港英政府的入境管控措施^⑯。F. Q. 228 的档案包含了英国驻大清国公使和英国领事馆等发出的关于中国事务的一般信件,内容涉及中国政府、港英政府、中国各港口、船队的情况,其中和鼠疫有关的多是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出入境变动和管制措施^⑰。

三 有关鼠疫的医学报告

1894 年 5 月鼠疫开始在香港蔓延,虽然到年底疫情有所放缓,但在以后的若干年,鼠疫仍是困扰香港的传染病。为掌控疫情及监察防控成效,港英政府相关部门会提交各类报告,其中对鼠疫疫情有较为完整描述的是医学报告。这类报告详尽描述了发病、病症、传染途径和预防、病人分布、各医院的疫情控制成效等,是殖民地医生撰写这些医学报告负责,再由当时负责香港医务和卫生事务的殖民地总医官(Colonial Surgeon)呈交立法局。

1894—1899 年这类医学报告有 5 份,分别是殖民地总医官劳森(Dr. J. A. Lowson)于 1895 年提交的报告,其中详列鼠疫的传播史、病因、病发期、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康复及后遗症、治疗及预防方法、恶劣卫生条件和天气对疫情的影响,1894 年爆发时的病例分布、各医院病人的统计、死亡数字等;报告记录了 23 个病例,详细列出病人的背景、染病途径、环境和疗效,既有医学价值,也是研究香港社会史的珍贵史料^⑱。殖民地医生韦尔曼(Dr. M. Wilm)在 1897 年撰写关

于香港鼠疫的报告中,从较为专业的角度讲述疫症的临床表现和细菌学检查结果的病理报告^⑧。殖民地代理总医官艾坚逊(Dr. J. M. Atkinson)于1897年提交了1895—1896年香港的鼠疫情况报告,报告中除了医学上的防治和各类统计数据以外,还罗列了邻近地区的疫情、其他政府部门对疫症的防控措施等^⑨。1898年的鼠疫报告由殖民地医生克拉克(Dr. F. W. Cleak)撰写^⑩。到1899年,医疗部门不再专门为鼠疫提交报告,鼠疫情况包含在全年的卫生报告中,原因可能是疫情基本趋于平静。

除香港政府官方报告,《英国医学杂志》(*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也收录了很多关于1894年香港鼠疫的医学报告。这些报告集中于1894—1897年,在疫情高峰期约有4份同类报告,20世纪初有两份报告较为全面和重要。这些报告总结了香港鼠疫患者的临床表现、医疗手段和防治方法,其撰写者多为当时在香港服务的英国医生,其中4份由卡特利医生(Dr. J. Cantlie)撰写,分别发表于1894年和1897年^⑪。曾任殖民地代理总医官的艾坚逊(Dr. J. M. Atkinson)于1906年发表香港鼠疫概况的报告,主要讲述了他在任时如何处理疫情^⑫。除了《英国医学杂志》,《北美回顾》(*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于1897年发表韦文医生(Dr. W. Wyman)的论文,以较大篇幅介绍了鼠疫在香港发生,其后蔓延至印度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过程,认为香港实为19世纪末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输出地”^⑬。《北美回顾》创刊于1815年,《英国医学杂志》创刊于1840年。这些刊物接连刊登关于香港鼠疫的医学报告,反映了当时的疫情影响范围大,以致全世界都甚为关注。

四 香港的中英文报章对鼠疫的记录

鼠疫由蔓延到平息的短短三四个月期间,香港社会要面对每天数以十计甚至更多人染病和死亡的困境,加上港英政府不断推出抗疫措施,诸如宣布成为疫埠,强行把鼠疫患者迁至传染病医院,安排埋葬鼠疫死者,强行消毒和清理民居,甚至迁拆华人密集居住的太平山,重新分配住房等^⑭,这些政策措施很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跟进和报道这些焦点的,则是各大报刊。

香港当时的中文报刊不多,《遐迩贯珍》(1853—1856)、《循环日报》(1874—1886)均已停刊,后来的《华字日报》(1895—1940)和《有所谓报》(1899—1903)尚未创刊,当时对香港鼠疫情况报道得最多的,反而是上海的《申报》。由1894年5月至1898年6月,《申报》都有跟进香港的疫情的报道,仅1894年就有接近100篇相关报道,这些报道集中在疫情最为严重的5—7月,8月以后疫症减少,关于鼠疫的报道也成为跟进或分析文章。鼠疫出现初期,《申报》不但报道了香港疫情、染病人数和社区、医疗情况等,也有大量比较中西医学的文章。《申报》秉持向国民灌输新知识的理念,很多有关医学的报道和评论文章,都赞同西医处理疫症的手法。自1894年5月5日起,《申报》开始及时地通报香港疫情。其中,5月报道疫情11次,疫情高峰的6月几乎是逐日报道,7月报道13次^⑮,8月之后疫情渐散,报道不再频密,10月《申报》还发表文章,呼吁大家不要松懈,留心防疫^⑯。

《华字日报》创刊于1895年,由于创刊时鼠疫在香港的高峰期已过,该报并未对香港疫情有太多关注。当时澳门鼠疫泛滥,而且蔓延到其他地方如日本及印度,因此《华字日报》创刊初期有很多关于日本和澳门的鼠疫报道,偶尔也会刊登港英政府防止疫症卷土重来的消息:“连日无疫。本港官府连日飭差轮查疫病,初七八连日未见病疫一人,似此港中无疫洵非虚语也。”^⑰

相对中文报章,香港的英文报章对疫情的报道详尽得多。疫症横行的1894年,香港的英文报章包括《德臣西报》(*China Mail*, 1866—1961)、《孖刺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 1870—

1941) 和《土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 1881—1951) 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鼠疫的新闻和跟踪消息。其中, 至 1899 年,《土蔑西报》关于鼠疫的报道超过 300 篇,《德臣西报》约 400 篇。《德臣西报》对其他地方的鼠疫报导较香港更详细, 可见这是一份较为具国际视野的报章。

上述英文报章对鼠疫的报道集中在下列 7 个方面: (1) 鼠疫疫情。(2) 抗疫措施。(3) 洁净局会议消息及记录。(4) 政府医生有关鼠疫的控制及医疗进展的报道。(5) 鼠疫的医学评论。(6) 邻近地区如中国大陆和澳门的疫情。(7) 个案描述。这些报道对了解当时社会情况及政府反应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较有价值的是对政府医生的采访报道, 以及西医针对疫情及中医手法的评论, 显示了香港的医学传统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医不科学。这些英文报章对疫情的报道往往带有殖民主义的观点和态度。例如认定鼠疫在华人社区肆虐, 元凶是华人不讲究卫生和清洁, 医治方法又极落后和不科学, 将华人社会对西方医学 (乃至欧洲文明) 的排斥以及笃信谣言视为无知与愚昧。《孖刺西报》曾评论道: “在香港, 中国人与欧洲人的日常接触和交流已经超过 50 年, 但是他们似乎仍然没有理解和欣赏英国统治的原则、道德与社会体系。我们看到华人工人阶级对外国人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诽谤, 他们的无知与愚昧充分地表现在最近广泛流传的、有关香港鼠疫病人治疗的谣言当中。”^①

细读这些文章, 也可从另一侧面了解香港华人在港英政府殖民管治之下的窘境。《德臣西报》曾刊出评论, 感叹英国对香港长达 50 多年的殖民统治没有对华人产生任何影响: “他们依然迷信, 依然拒绝欧洲文明和科学, 依然无知和充满偏见。而这些特征在刚过去的鼠疫危机中暴露无遗。通过暴力与阴谋, 华人居民努力颠覆政府处理鼠疫危机的安排。”^②

外文报章对疫情的报道还真实地呈现了病人的惨况。例如《土蔑西报》在 1894 年 7 月 31 日以“恐怖之屋”(chamber of horrors) 来形容东华医院病房: “很多病人被锁着, 像动物一样被关押, 男女混杂在一起。这些精神病患者的衣服肮脏不堪。”报纸质问这样的不人道情况为何会在一个英国殖民地出现, 要求当局向东华医院施加压力, 以改善这种恐怖状况^③。

这些英文报章都注意对疫情做较为详尽的跟进报道, 如每天新增患病、死亡、康复人数, 各医院病人分布、政府的最新措施及防疫进展, 大致反映出 1894 年鼠疫在香港流行和平息的具体过程。

检视关于 1894 年香港鼠疫的中外文资料, 可以了解这场开启了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之门的疫症如何从出现到平息。当年鼠疫在香港虽然只是肆虐了半年左右, 但造成的社会及公共卫生影响却是深远的。关于鼠疫的政府档案呈现了更多当时的社会现状、香港的医疗条件、港英政府对华人的管治模式以至香港公共卫生系统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报章资料则在社会的层面对这场疫症有更深刻的描绘, 展现了疫情肆虐下香港居民的生活、港英的抗疫措施反映出的中西文化差异。这些资料, 有助于对香港传染病以及医疗建设进行更多的探讨, 以厘清事实, 并推动香港社会史的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 B. W. Brown,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disease in Hong Kong”, *Public Health Reports*, Vol 28; No 12 (1913), pp 551—557.

② C. J. Martin, “Discussion On the Spread of Plague”,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2. No 2654 (1911), PP. 1249—1263.

③ G. H. Choa, “The Lowson Diary: A record of the early phase of the Hong Kong Bubonic Plagu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33 (1996), pp 129—145.

④ 沈维逊:《鼠疫流行史》, 广东省卫生防疫站 1989 年版, 第 203 页。

⑤ 李永宸、赖文:《岭南瘟疫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21 页。

⑥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o the Affairs of Hong Kong 1882—1899”,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 China 26. Shannon; Irish U-

- 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55.
- ⑦W. J. Simpson, "Plague in Hong Kong",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1. No 2204 (1903), pp. 755—757.
- ⑧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Health (ed.), *Public Health Reports* (1896—1970), Vol 21. No 24 (1906). pp. 655—656.
- ⑨⑩J. M. Atkinson, "Plague Procedure in Hong Kong,"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2. No 2398 (1906), pp. 1715—1718.
- ⑪⑫⑬⑭⑮⑯香港大学图书馆藏香港政府档案,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 175, 208, 495, 111, 494, 8, 354,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94—1896。
- ⑰香港大学图书馆藏香港政府档案, Governor's Despat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Plague in 1894 (20 June 1894). *Sessional Paper*, 1894。
- ⑱⑲⑳James A. Lawson. Medical Report on the Epidemic of Bubonic Plague in 1894 (2 Mar 1895); M. Wilm. Report on Plague (20 May 1896). *Sessional Paper*, 1894—1896.
- ㉑Reports on the Tung Wa Hospital. (17 Oct 1896), *Sessional Paper*, 1896.
- ㉒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63; 杨祥银:《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课程哲学博士论文 2007年,第106—123页。
- ㉓香港大学图书馆藏香港政府档案, *Hong Kong Hansard*, 11—Jun—1894, 27—Aug—1894, 3—Sep—1894, 17—Sep—1894, 28—Nov—1894, 6—Dec—1894, 22—Dec—1894, 24—Dec—1894, 26—Feb—1895, 12—Mar—1895, 20—Mar—1895, 26—Mar—1895, 28—Mar—1895, 4—Apr—1895, 11—Apr—1895, 23—May—1895, 6—Jun—1895, 16—Aug—1895, 25—Nov—1895, 5—Dec—1895, 11—Feb—1896, 8—Jul—1896, 22—Jul—1896, 3—Dec—1896, 3—May—1897, 10—May—1897, 31—May—1897, 25—Oct—1897, 25—Jan—1898, 29—Aug—1898, 10—Oct—1898, 22—Nov—1898, 22—Dec—1898。
- ㉔香港大学图书馆藏香港政府档案, *Hong Kong Blue Books*, Public Works, 1894; Hospitals, 1894; Comparative Statement of the Revenue of the Colony of Hongkong for the Years 1894 and 1895; Public Works, 1895; Public Works, 1896; Hospitals, 1896; Hospitals, 1897; Hospitals, 1898。
- ㉕②④⑤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Hong Kong, 1841—1951, Series 129 (CO129); General Correspondence; China 1815—1905, Series 17 (F 17); Embassy and Consular Correspondence, 1834—1930, Series 228 (F 228),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 ㉖J. M. Atkinson. Prevalence of Bubonic Plague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Years of 1895 and 1896. (4, June, 1897). *Sessional Paper*, 1897.
- ㉗Francis W. Cleak, The Epidemic of Bubonic Plague in Hong Kong in the Year 1898. (25 August 1898). *Sessional Paper*, 1898.
- ㉘James Cantlie. The Plague in Hong Kong.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s.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2. No 1756 (1894), pp. 423—427; James Cantlie. Abstract of An address on the Spread of Plague.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1. No 1880 (1897), pp. 72—75; James Cantlie. Remarks on the Treatment of Bubonic Plague.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1. No 1883 (1897), pp. 249—251; James A. Lowson and James Cantle. The Bacteriology of Plague.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1. No 1882 (1897), pp. 237—238.
- ㉙Walter Wyman. The Black Plague.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64. No 485 (1897), pp. 441—452.
- ㉚刘润和:《香港市议会史 1883—1999》,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02年版,第56—59页。
- ㉛《申报》1894年5月至7月有关香港鼠疫情况的报道,包括《电传疫信》《西人言疫》《港疫续纪》《疫信照登》等。见上海书店申报影印组编:《申报》,上海书店 2007年影印版。
- ㉜《留心防疫》,《申报》1894年10月11日。
- ㉝香港中央图书馆藏《华字日报》,1895年5月3日。
- ㉞香港中央图书馆藏 *Hong Kong Daily Press*, 25 May 1894。
- ㉟香港中央图书馆藏 *China Mail*, 10 July 1894。
- ㊱香港中央图书馆藏 *Hong Kong Telegraph*, 31 July, 1894。

(作者黄雁鸿 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学术编辑)

(责任编辑 赵增越)